

刘意青

英语教育
自·选·集
徜徉书间

·
刘意青 著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 ■ 刘意青英语教育自选集

Liu Yiqing's Anthology o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刘意青

英语教育
自。选。集
徜徉书间

刘意青 著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 ■ 刘意青英语教育自选集

Liu Yiqing's Anthology on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意青英语教育自选集：徜徉书间 / 刘意青著.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5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

ISBN 978-7-5135-9129-4

I. ①刘… II. ①刘… III. ①英语—语言教学—文集 IV. ①H3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0481 号

出 版 人 蔡剑峰
选题策划 刘相东
责任编辑 毕 争
执行编辑 解碧琰
封面设计 袁 璐 李双双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29.5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9129-4
定 价 89.90 元

购书咨询：(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物料号：291290001

出版前言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丛书第一批共推出 10 本，入选作者有王宗炎、桂诗春、胡壮麟、胡文仲、戴炜栋、秦秀白、刘润清、张正东、文秋芳、刘道义等英语教育名家。第一批 10 本已于 2008 年 1 月全部出齐，在我国英语教育界获得广泛的好评。

本丛书第一批 10 本书突出了“英语教育”这一主题，所收论文都是跟英语教育和教学密切相关的。但我们发现，很多奋斗在英语教育一线的专家、学者并不一定以“英语教育”作为主要研究课题。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从事语言学、文学、翻译、社会与文化、词典学、文体学或其他应用语言学分支学科的研究。本丛书第二批的视野将更为开阔，以期更加全面地反映我国英语教育名家的科研成果。例如，第二批中的第一本《钱冠连语言学自选集》收录了作者在语言学研究方法、语言哲学、语言全息论、语用学、美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第二批将是开放式的，成熟一本推出一本，直至 10 本出齐为止。

本丛书专收我国知名英语教育家的学术论文，以填补两方面的空白：1. 以英语教育名家为主线的自选集。2. 以英语教育、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为主题的系列丛书。本丛书同时入选“北京外国语大学校级自选课题项目”。本书的读者对象为英语教师、英语专业研究生、师范院校英语本科生等，可作为他们从事科研、撰写论文的参考文献。入选的文章多散见于国内外学术期刊，且时间跨度很大，读者不易觅得。自选集展示了诸位名家对英语教育及相关学科的研究脉络，汇集成丛书，将成为我国英语教育史上不可多得的史料。

与此同时，《世界应用语言学名家自选集》也由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陆续推出，敬请读者关注。

本丛书的编写体例如下：

一、只收发表于刊物或论文集集中的学术论文以及学术演讲，字数没有限制。专著中的章节一般情况下不收。

二、所收论文的语言仅限汉语和英语。

三、所收论文大多为原已发表过的文章，基本保持原貌以尊重历史的真实。文章一般注明论文发表的时间和发表刊物的名称（或论文集名）和期号（或出版社名）。文章格式也基本保持发表时的原貌。未在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如演讲等，则注明对外发布（成稿）的时间、地点和场合。

四、作者可将新的观点以尾注的方式放在当篇论文的后面，表明作者目前的观点与当时有所不同。

五、书前有作者撰写的《我与中国英语教育》为自序，详细地记录了作者求学、教学、治学的经历和感悟。书后附有作者主要学术著述的目录。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编委会

2013年5月18日于北京

自序

教书育人，学无止境：英语语言、文学与我

我出生于教师家庭，父亲、母亲都是教师，姑姑、姨妈、堂兄也都是教师。所以，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要选择其他职业。在我念大学和毕业的那个年月，学生都是听从组织分配，我留在了母校北京大学任教，这一干就是一辈子。而且幸运的是，不论经历“文化大革命”的风雨，上山下乡劳动改造，还是三次出国学习，我在北大的教职一直保留下来。到2006年65岁退休时，我在教育岗位上已经整整42年。2008年因公需要，虽已退休，我又被北大启用，派往新疆石河子大学担任该校外国语学院挂职院长。工作近两年后，因冬天路滑，我在结冰的路上摔了跤，造成脚腕骨裂，返回了北京。前前后后加起来，我在外语院系教书和工作大约是44年。

一、启蒙年月

新中国成立时，我父亲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研修。由于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当时英国政府对中国留学人员控制很严，要他们定期去管理部门汇报自己干了什么、去了哪里，因此很难返回祖国。1951年我父亲响应周总理号召，克服困难绕道法国到中国香港最后回到北京，被政府安排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这样，我母亲带着我们姊妹三人从四川北碚顺长江而下，到了汉口换京广铁路北上，与我父亲会合。那时我10岁，因北碚的课本不同，我连报考西苑乡下颐和园小学插班生的成绩都不大够，最后获得一个“备取资格”，等有了空位子才上了学。小学毕业后，初中我考入城里的孔德中学，比小学强了许多。高中再进一步进入了

重点学校北京女一中。我文科成绩很好，但外语学的却是俄语。

高考时，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大学俄语系，第二志愿是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我高中的俄语成绩特别好，但奇怪的是我被录取到了英语专业。当时班上大多数同学高中学的是英语，比如后来的外交部长李肇星。班里与我一样学俄语的学生大约四个人，自然一开始我们在学习上就处于劣势。我父亲是个很民主的家长，对我高中学俄语和报考俄语一直鼓励，也从来没给我吃过小灶，没有在课外教我一点英语。所以一年级时我在英语专业十分困难，不但从零开始，而且还要不断抵制来自原来学的俄语的语音、语法等干扰。二年级暑假，我父亲头一次指点我，他给了我十几本简易英语读物，包括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双城记》、吉普林的《丛林故事》和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英译本等，还有四册英国出版的《基础英语》课本（*Essential English*），并让我听林格风录音。慢慢地我对英语有了感觉，而且非常喜爱。大学三年级罗经国先生开设了英国文学史和选读课，从此我爱上了英国文学。作为毕业论文的训练，我们四年级要完成一篇学年论文。我选择了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导师是吴柱存教授。四、五年级时我们的师资特别强，摘了“右派”帽子的吴兴华教授回西语系教我们英语作文，著名翻译家张谷若（即张恩裕）先生开设了高级翻译课。他们两位水平很高，能得到他们的指点，我感到十分幸运。这时我已经成为班上名列前茅的学生。五年级毕业时我跟从张谷若先生，针对哈代名著《苔丝》做了学士学位论文。到此时，我方可以说完成了自己从俄语到英语的转身。

北京大学集新中国成立前北大、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学者，很多都是老清华和西南联大的精英，教师队伍强大。我一、二年级的精读课老师有周珊凤、龚景浩、陶洁和张祥保等。他们强调语音和语法精准，每天早上都深入学生当中进行个别辅导。为了看清楚学生的舌位，有一次周珊凤先生蹲在学生跟前看嘴型，令我非常感动。杨周翰先生开设的“英国历史”课十分重要，它基本上解决了学生们关于英国语言、文学和文化的背景知识的需求。三年级的精读课是林筠因先生和孙亦丽老师教，还有俞大綱教授来串讲。我记得俞先生非常活泼，一次她在课上讲罗宾汉故事，

不用教材，让学生分两组比赛复述她口授的内容。我为我们组挣得一个100分，那堂课一直难忘。三年级的泛读课是吴柱存先生教，美籍教师玛茜利亚·叶教口语，还指导我们演戏。我在大学前四年里演了萧伯纳短剧，参加翻译并出演了当时很受欢迎的中国舞台剧《年青一代》，还排演了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的法庭一场。此外，我们还有全校的通选大课“欧洲文学史”，是李赋宁、赵萝蕤、吴达元、冯至等一流学者串讲，大师们对文学的热爱和深厚的学识深深地触动了我。我还记得赵萝蕤先生在几百人的阶梯教室讲授英诗时，动情地闭着眼睛背诵彭斯的诗歌《我的心在高原》。就是这样，北大西语系的五年时光引我进入了一个新天地，让我萌生了对英语和英国文学的浓厚兴趣，也不知不觉地在我心里树立了好教师的榜样。

二、社会大课堂的教益

一般人都觉得我们这些在“文化大革命”前完成了大学教育的人运气真好。这话有一定道理，因为那些“文革”开始还在校的学生都赶上了停课闹革命，两年后都带着没学什么东西的遗憾被分配到社会上。但是我们这一代学生在校五年，实际学习也就是三年多，其他时间都花在劳动和政治运动上了。我进校是1959年，“反右派运动”过去不久，但党内又开始了“反右倾”和整党。我不是党员，又是学生，因此当时并不知情。学生们只知道每周六下午必须进行政治学习，读文件，然后发言表态或进行自我检讨。我检讨最多的是走“白专道路”。此外劳动很多：我们刚进校就开往密云水库，在烈日炎炎之下光脚拉沙子一个月；三年级秋冬之际又去十三陵修铁路一个月；四年级我们按照教学安排要下农村锻炼两个月，我被分配去为大家做饭。另外的零星劳动包括每年割稻子、收麦子数天，还要参加学校里临时的劳动和卫生运动等等。三年困难时期，不少学生因营养不良而浮肿。去十三陵修铁路回来后我被定为二级浮肿（一级是脸肿，二级是腿肿，三级是全身浮肿）。那一年因浮肿，学校减轻了课程和其他的会议、政治学习及社团活动，我却借此得到更多的自学和读书时间。应该说这对我三年级打了学习翻身仗很关键，坏事也

就变成了好事。

1964年毕业留校后我马上被派到“四清工作队”，先是在近郊定福庄，后来转到门头沟山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1965年我利用“五一节”放假成婚，后来因为在门头沟每天背粪上山，有了先兆流产症状，开始注射黄体酮保胎，但学校直到秋季学期快结束时才让我返校。这样，1966年春季学期就成为我留北大任教后头一次登上讲台的时间，我当时已经怀孕七个多月。我们那时候没有现在孕妇的各种照顾，我一直上课到阵痛开始的那天上午。下午我自己回到父亲家中，晚上母亲送我去北医三院。产假是56天，我回北大就赶上“文化大革命”，接下来的年月就是贴大字报，全国大串联，学校分两派搞“文攻武卫”。工、军宣队进校后开始了上管改，我们被送去劳动改造。复课闹革命后，我们部分“问题较少的”教员又领了任务，带领招来的工农兵学员到野战军学操练、射击和扔手榴弹，到外印厂去搬运纸张、书报，到很冷的延庆去挖战备防空洞。这中间每天安排半天在炕头、田间上英语课。1971年前后我还被分配到北大在鄱阳湖填湖造地的改造知识分子的农场。农场的下放教师们不论老少都在有冰碴子的水田里春耕翻地，在40度高温下抢收抢种水稻；每晚还要一边被蚊虫叮咬，一边开揭发和批斗会。我到农场一年后，因鄱阳湖又有了血吸虫病，清华和北大的“五七战士”们才被叫回北京。1977年的全国高考人才济济，北大英语专业招收了六七十个优秀的年轻人。这之后我们才谈得上正式地、像样地上起课来。

“文化大革命”前后约十年的劳动和政治运动的确阻碍了我的英语进步，也迟迟没能让我学习如何教学。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段生活当作负面经历。相反，我认为是这段经历使我了解我国的城乡，了解工人、农民和战士。我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当时被班里干部称为“出身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在学校念书，是“下放”和“文革”让我走出了象牙塔，大大地拓宽了眼界。虽然我从事过多种非常重的劳动，吃过苦，挨过整，但因此我成长和成熟了，我为自己成为老百姓的一员而自豪。中国的劳动人民贫穷得让我心痛，他们的淳朴、耐劳和大爱让我感到自己的渺小。通过这一段与工农兵的近距离相处，我

改变了很多，有了一颗“平常百姓的心”。

这里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在门头沟山里“四清”时住在孤苦老人姜大娘家。她儿子新中国成立前是游击队干部，新中国成立后进了城，她却不肯跟着去“享福”。老人是“解放脚”，走路颤巍巍的，生活自然不大方便。当时是人民公社，农民干一天活最多记10个工分，到年底按工分换粮食，所以他们手头没有钞票。姜大娘每天出工，主要是跟妇女一起砸核桃，或给玉米脱粒。核桃分单层皮和夹层皮两类，单层皮敲开后桃仁就掉出来，夹层皮核桃的仁儿要一点点抠出来。因为一天下来是按照剥出来的核桃仁的分量记工分，所以姑娘和小媳妇儿都抢着砸单层皮核桃。但姜大娘就专检夹层皮的核桃砸，还时常批评那些滑头的妇女。门头沟山里没有大片的土地，沿着山坡而上的小块梯田多半种的是谷子和高粱。他们队里的收入则主要靠山上的核桃、花椒和蜂蜜。老百姓的粮食不够吃，要掺着吃野菜和杨树叶子。姜大娘把杨树叶子用水煮过后，把苦水倒掉，叶子剁碎，和着高粱米面或小米面蒸饽饽吃。但是当她得知我怀孕并有先兆流产症状后，她把自己储存的用来换油盐酱醋的宝贵鸡蛋拿出来，坚持要我每天吃一两个。这样我的大女儿出生时基本健康，她的命是贫苦农民给的。姜大娘把我当女儿，她怕我冷，每晚要我挨着她睡，要把她的棉被搭在我的被子上面。虽然最后我染了一身虱子，但我一点不嫌弃她，她就像我自己的老人那么爱我，那么慈祥。

另一个例子是解放军战士不怕牺牲的精神。复课以后，我们和学生一起到野战部队去学军，每天一早跑操，上点英语课，其余时间就是操练正步走，学射击和投手榴弹等等。每班都配有小战士陪同，特别是实弹操练时他们就寸步不离，防止意外。这些小战士非常诚恳、单纯，但个个不怕苦、不怕死，愿为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献出生命。他们每天吃着糙米粗粮，平时只有熬白菜，很少吃肉。但是他们总是乐呵呵的，充满了朝气。练习手榴弹投掷时，我们很多人达不到投出最低18米的安全指标。于是，解放军别出心裁地把我们安置到小山坡上，向山坡下投手榴弹。即便这样，陪同的小战士仍十分警觉地站在每个投弹人的身后，准备万一我们紧张了，把手榴弹扔到脑后时，他就要拾起来扔出去，

或者扑到手榴弹上。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从国民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的无数为中国的今天而牺牲的烈士的身影。他们平凡、无名，但他们伟大。我发自内心地喜爱这些战士，要向他们学习。将近十年的下乡、上山、学工、学农、学军就这样构成了我的社会大课堂，从中我找到了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归属。

三、学徒期的教学经历

我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前一直是个基本语教员，教过精读、泛读、听力、语法等课程，经历过教材和方法的许多变动。“文革”刚复课时，工、军宣队不懂行，不许我们使用“文革”前许国璋编写的一、二年级课本和俞大綱编写的三年级课本。于是在周珊凤先生带领下，我们一年级教学小组每天编写课文、对话、听写等教材，现炒现卖。我们几个年轻教员快速编写的教材都经过周先生细心修改，然后使用。这一过程虽然对正规教学而言显得荒唐，但却给了我提高英语水平和锻炼编写教材能力的好机会。当时的教材不能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因此除去教授基本语法和词汇，教学内容大多是学习生活和劳动生活，比如开会、行军、割麦子，而词汇则多是窝头、馒头、小米加步枪、无产阶级专政和毛主席万岁等。这样教了一段以后，周恩来总理大概得知了这种情况。他特地来到北大视察，接见了部分英语教师，并指出：面包、牛奶和王子、公主也需要教给学生，这不是资产阶级内容，否则西哈努克亲王来访时我们的翻译就做不好了。

极“左”思潮在教学上还表现为不顾英语学习循序渐进的规律。当时我们英语专业归部队派来的某营长负责。他本人一点不懂英语，也不懂教学，曾经开玩笑地说：“英语有什么了不起，我也会”。就是他，在复课以后要求我们教学像“大跃进”那样“放卫星”，即每周要教会学生一二百个单词，而且很多是类似 exercise、proletarian、dictatorship 这样的长词。他把我们教学小组组长老师叫去，让他推行这个不可行的“跃进”，遭到抵制。他于是在大会上批评知识分子有三个屁股，即老虎屁股摸不得、大象屁股推不动、猴子屁股坐不住，还很得意他自己的“洞见”。组长抵制他后，他又先后找王逢鑫老师和我，用封官许愿动员我

们带头实现他的想法。我们都拒绝了，因此招来了随后挨整的后果。

周珊凤先生是我最尊敬的老师，是我学习教学方法和提高英语水平的师傅。她出身名门，父亲曾任清华大学校长，丈夫是有名的画家。她本人十多岁时赴美念书，在美国完成了大学学业。她的美国英语精准，是国内顶尖的语音专家，十分难得的师资人才。尼克松访华时，周先生讲了示范课，之后尼克松高度评价她说：“没想到中国有这样优秀的教师。”“文化大革命”前，周先生的丈夫李宗津先生被定为“右派分子”，“文革”中周先生全家也遭到许多不幸。李先生患了癌症后，子女都在外乡，他们连换个煤气都成问题。但周先生始终全力以赴地从事教学和教材编写工作，不计名利，没有一点怨言。我从1973年开始断断续续地跟从她教学十多年，不少教案和编写的听写和测试卷子等等都经她修改过。从她那里我学到了很多教学的方法、技巧、点子，并补上了不少我因基础薄弱、学习时间不足而造成的英语漏洞。

周先生爱国、正直、敬业、两袖清风。她不但业务精湛，而且是我为人处世的榜样。仅举两例说明。她教导我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要多查词典。所以我们从来不在学生面前摆谱，答不出学生的问题时就告诉他们等我回去查了词典后再回答。但我经常偷懒去问周先生答案。一次晚上约9点钟我备课时发现有不明白的地方，就打电话问她。周先生一时没有答案，说要去查词典。我让她别急，我明天可以先不讲这个问题。结果第二天我出门去上课时，发现周先生夜晚来过了，答案就贴在我的门上。第二个例子显示了她的大公无私。新中国成立后，周先生一直没回过美国，尽管那里还有她的哥哥。20世纪80年代，她在美国的母校校庆，特别邀她返校，一切费用对方支付，她接受了。回国时，该校给了她一个研究生名额，并告诉她随便她推荐谁去念书，该校都接受。周先生有自己的儿女和第三代孩子们，也有亲戚朋友的孩子。他们大多在“文革”里耽误了学业。但是周先生把这个名额交到了系里，请系领导选一位优秀的年轻教师去美国读书。当时的总支书记把这个珍贵的名额给了紧紧跟随她的一个教员，而此人一去不回，把丈夫接到美国，生了多个孩子。周先

生后来提起此事只能摇头感叹说：“原想给系里培养人才，没想到名额就这么浪费掉了。”周先生一生平凡，临去世前还不忘贡献，拒绝任何告别仪式，捐献遗体，用于医学解剖。她就是我终身不忘的恩师，是我的引路人。我很幸运能追随这样优秀的前辈学者从事我的早期教学。

四、英美留学的收获与体会

我出国多次，但与念书和教学有关的一共四次。1973年英国（对外）文化协会提供给中国25名教师赴英培训半年的机会，我和王逢鑫老师被选中，其他高校如北京外国语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复旦大学等也都派送了一到两名老师。虽然对方指明机会是给教师的，目的是提高教师的听说能力并讲授理论和教学方法，但是新华社、外交部、经贸部、体委等也都选派了人员参加培训。我们到达埃塞克斯大学附近的科尔彻斯特后，分散居住在英国人家里，每天坐公交去培训中心上课。开课前，我们参加了分班考试，做了250道听力测试题，结果我和王逢鑫都分在了高班（Advanced Class）。上课的两位教授都是语言学专家，除了听讲授，我们大量时间都在语音实验室里操练，做听说练习。对于我这个俄语出身，主要靠语法学英语，因此听说都有困难的人来说，这次的培训真是雪中送炭。我没有像有些同去的伙伴那样忙着参观和购物，我知道必须抓紧这次难得的机会。培训结束时，我基本解决了自己听说迟钝的问题，当然也近距离地了解了英国很多习俗、文化和历史。

1979年根据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与北大签订的交换项目协议，我获得机会去该校访学一年。我当年38岁，系里认为我只需出国镀个金，而不应该再念学位，而且明确地告诉我：“北京大学的讲师到美国念硕士丢人。”但我下定决心不能只满足于走马看花，要抓住机会提高自己。所以，我一到学校就申请进入那里的硕士项目，而且在试读两周后获得该校英语系批准。这样，我就师从系主任、有名的马克·吐温研究专家 John Gerber 开始研修美国文学。我还选了全美斯宾塞协会主席 Hugh Maclean 教授和其他两位从事莎士比亚研究的教授的课，以及 Hastings 教

授教的乔叟和中古英语课，还有 Nelson 教授的 Creative Writing。按交换协约，美国方面来北大的教师或学生由北大负责往返费用和生活费；而中方派去的教师和学生则由美方负担经费。除了往返的机票，我每月得到的生活费只有 400 美元。但我的交换期是一年，如果我不按期回国，就影响了后面来交换的教师。为了让我完成学业，奥本尼分校的外事处负责人就主动帮我申请了一笔奖学金。这样，我脱离了交换项目，就不影响其他人于次年获得赴美访学的机会了。实际上，我比规定的两年硕士期限提前半年通过了学位考试，只延期半年就回到了北大英语系。硕士资格考试那天正好赶上我的生日，外面飘着大雪，我足足做了四个多小时的考卷。硕士学习的经历令我终生难忘，我克服了许多困难，坚持追求提高自己学业水平的目标，并在 40 岁时获得了迟到的硕士学位。

我放弃了布朗大学已接受我念博士的机会，按照北大领导的要求立刻返回了北大。回校任教五年后，芝加哥大学、布朗大学、爱荷华大学、布法罗大学等四所美国大学录取我去读博士，我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但是，北大英语系认为我已经出过国，不需要深造了。而且个别领导再次告诉我北大的副教授去美国念博士丢人。最后是我的美籍华人朋友，北大的荣誉教授王浩先生出面写了信，校系才不得不同意给我这个机会。我父亲此时已身患癌症，但他坚决要我去念书，因为他知道我英语底子薄，始终怕我不能真正胜任教学工作。我这一去就是五年，非常辛苦和孤单的五年。因为年纪大，我从不浪费时间出游或交际。我用一年完成了课程学分要求，用暑假攻读法语，并通过了第二外语考试，再用一年准备博士资格考试的书单：一本本、一篇篇地读了 100 多件。资格考试顺利通过后，我定了英国 18 世纪小说为论文方向，跟从知名的研究 18 世纪的专家 J. Paul Hunter 教授。在他的指导下，我花了一年时间读完了近 15 年来关于所选的作家和小说的批评资料，并写出约 50 页的论文大纲（Dissertation Proposal）。导师看了大纲后只说了三个字：“I like it.”我把论文大纲寄给远在北京的父亲，他看后欣慰地回信说：“我放心了。”最后一年我突击般写出了论文，并通过了答辩，获得了英国文学博士学位，这

一年我 50 岁。我父亲却在看过我的论文提纲后不久去世，但家里人瞒着我，怕我赶回中国奔丧而不能再返回芝加哥拿这个学位。我的心痛只有自己知道，我唯一能做的只剩下更好地教书，像父亲希望的那样把自己贡献给英语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

2000 年我获得富布莱特讲习教授的机会再次赴美，只是这一次我不再是个学生。我被所在学院要求讲授中国历史、文学和文化，特别是中国现代小说。这对我又是一个挑战，备课任务很重，但我还是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五、外语教学与研究服务于实现中国梦

说到用所学知识报效祖国，我的确尽力这样做了。从 1991 年回国到 2006 年退休，我开设了英国 18 世纪文学、美国早期文学、加拿大小说、《圣经》文学等本科和研究生课程，指导了数十份学士论文和硕士毕业论文，培养了七名博士生。在科研方面我出版了多部专著、文学史和教材，还发表了 40 多篇文章。20 多年中，我身体力行了“学无止境”。以我博士研究的方向英国 18 世纪文学，以及硕士期间学习的美国早期和 19 世纪文学为起点，我又拓宽到加拿大文学和《圣经》文学，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不是外语界教学指导人士，也没有参加过教育部关于外语教学的决策。因此，我只是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里为我国外语教学完成了以下几件工作。

1. 从 1994 年起，我用了约十年时间无偿地帮助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搞师资建设，在北京大学英语系和北大研究生院的大力协助下，分两批先后为该校外院培养了五名语言学硕士教师和五名文学硕士教师，并帮助延大外院获得了培养硕士生的资格。到目前为止，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已成为陕北重要的外语教学阵地，并培养了多批硕士生。

在开始时，我去帮助延安完全是个人行为。事情是这样的，曾经在北大任教的美国老教授布里吉德·克阿后来到延安外院工作。但在延安工作五年后她眼睛失明，于是请求我帮她完成提升延安外语教学和师资队伍的心愿。一个外国人能够这样无私地为

中国教育做出贡献，我怎么可以拒绝她的请求。就这样，从1994年我开始用暑期跑延安，给那里的教员上课，但是这样并不能彻底解决他们的师资需求。于是我征得北大研究生院同意，为延安代培教师。我与英语系领导一起设置了延安这个硕士项目的课程，并亲自到延安去进行招生考试，从二十多名教师里录取了五名语言学硕士生。接下来克阿教授在国外为延安聘来了语言学专家和第二外语教师，负责教他们必修的相关课程。而我在北京就对着录音机把英美文学两门课按照上课那样，分节录制在盒式录音带上，寄到延安，进行远程授课，期中和期末我要求他们写论文或考试。当他们完成了硕士课程的学分要求后，我找了北大英语系的四位教师加上我，每人指导一位延安硕士研究生教师，通过电话和邮件反复修改他们的论文。最后，我们五名北大老师赴延安大学进行论文答辩。延大把这次答辩办成了全校观摩的公开答辩。三年后，学校又同意我通过统一招生收了五名延安教师读文学硕士。他们同其他研究生一样到北大来修课和做论文，在我的指导下最后也获得了硕士资格。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支持他们申请硕士点，胡家峦教授和我都应邀担任他们硕士点的外请导师。在延安外院获得硕士点并开始招收硕士生后，我多次去过那里，帮助年轻的导师们做好指导硕士研究生的工作，每次还顺便给全院学生做一两个报告。为了鼓励师生好好读书，我用自己的工资储蓄在延安大学外院设立了一个十万元的奖学金，该校又配套十万元，每年奖给品学兼优的学生和优秀教师。

2. 2008年我被北大派到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援其工作，担任该校外国语学院挂职院长。退休前我在北大担任过副系主任和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但从来没有独当一面。石河子市是兵团所在地，教师和学生绝大多数为汉族人。该校是由当地原来的师范学院、农学院和医学院等院校合并而成的。农牧院系很强，但外语学院师资较弱，而且存在党政不合等矛盾。我上任后开始了每天办公、听课和开会的生活，还有很多会议和各种报表。为了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我发起了类似学术沙龙的聚会，提倡教师多读书，但收效不大。我也做过示范讲课，听了不少老师的课并提出

自己的建议。此外，我还接受了指导四份毕业论文的任务。因为石河子大学的校系图书馆藏书很少，外国文学的文本和批评书刊更是凤毛麟角，学生长期重复做前面学生做过的论文，并从网上拷下资料放进论文里。我无法改变大局，但托人在北京大学给我的四个学生复印了许多参考资料。最后他们四个人都通过了答辩，顺利毕业。其中一个学生以迪金森的诗歌为题材写的论文，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

一年半后我在结冰的路上摔坏了脚腕，打了石膏，院里的老师们对我照顾得很周到。一个月后拆了石膏，我改用双拐，被送回了北京。但是，回京后虽然工资已经停发，我的挂职院长头衔仍没取消，新去的北大副院长与那边的院领导出现意见分歧时，双方都不断给我打电话。另外，还经常有石河子的学生、老师和干部来北京办事，我就不断地接待。这样的远距离管理工作一直延续到2011年我的三年任期到期后才结束。

在石河子大学外院任职期间，我做了几件有意义的事情。第一件事听起来有点滑稽，那是我上任后第一次参加聘任教员时的一件事。那年俄语系有五个应聘的女生，其中一个笔试成绩比其他入高出20分，试讲也不错，但个子比较矮。当时的常务副院长坚决不同意录用她，理由是石河子大学有规定，女教师身高必须在1.6米以上。我坚持要依据学术水平录用，不能看外貌和身高。于是反对者一直闹到校人事处，人事处长告诉我院领导们意见不统一就不能录用。为此，我直接找了校党委周生贵书记，并声明说如果不录用这个应聘者，我就辞掉院长，因为我也不够学校要求的身高。周书记称赞了我，拍板录用了这位学生。录用后，她的教学口碑很好，成了俄语系的骨干教师。

第二件事是在北大外国语学院支持下，我主持召开了石河子外国语学院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会议由石河子大学、台湾淡江大学和北京大学三校联合召开，议题是英语教学、语言学和文学。台湾来了近二十位老师，北大由程朝翔院长带队来了十几位老师，石河子外院所有的教师没课时都参加了研讨。研讨会的大会小会上发言热烈，之后我们组织客人们游览了新疆景点。整个会议十分成功，不过我很辛苦。虽然石河子外院的老师们和行政人员都